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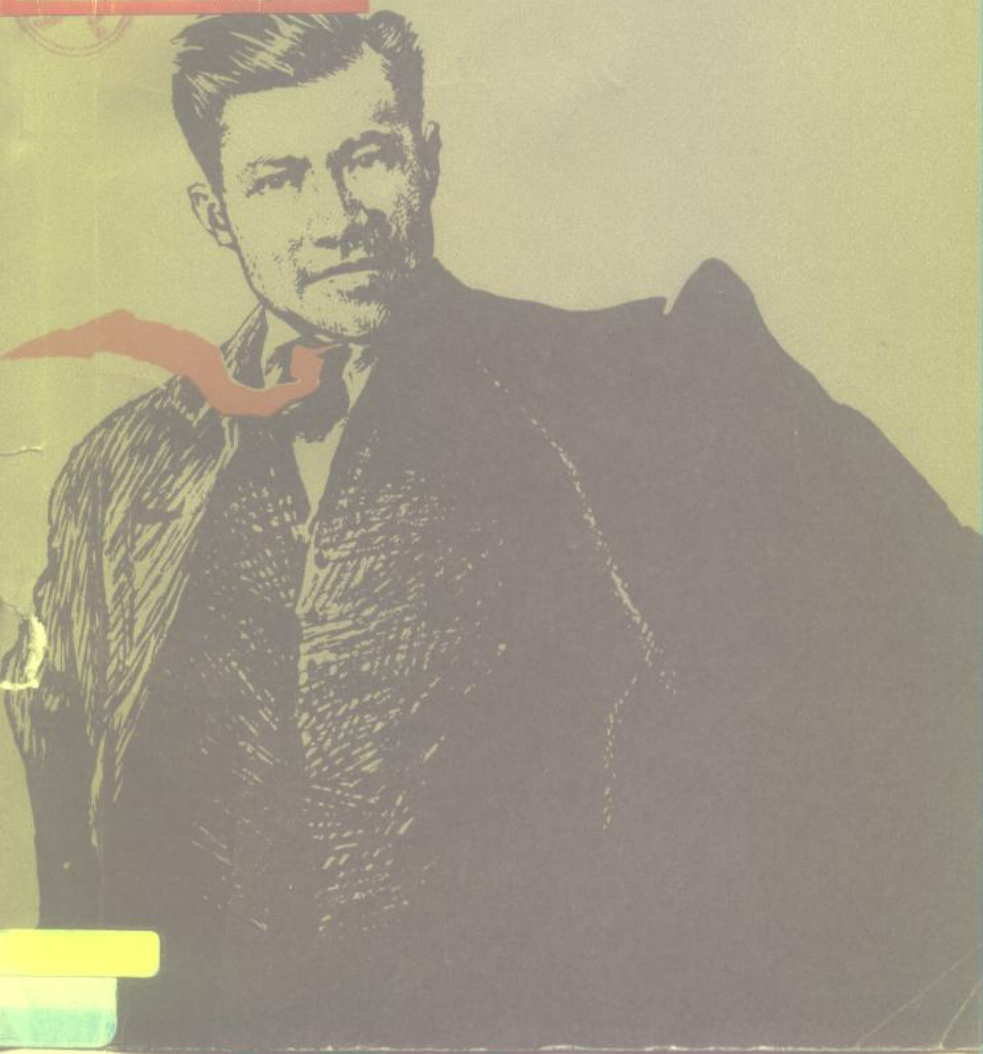
我学习音乐的经过

中央音乐学院图书馆藏书

书号 E5.1.54/tcDe69

总记号 121787

冼星海



中央音乐学院图书馆藏书	
书号	7400.550
总记 登号	121787

我学习音乐的经过

冼星海

人民音乐出版社

一九八〇年·北京

封面设计：柳成荫

我学习音乐的经过

冼星海

*

人民音乐出版社出版

(北京朝内大街166号)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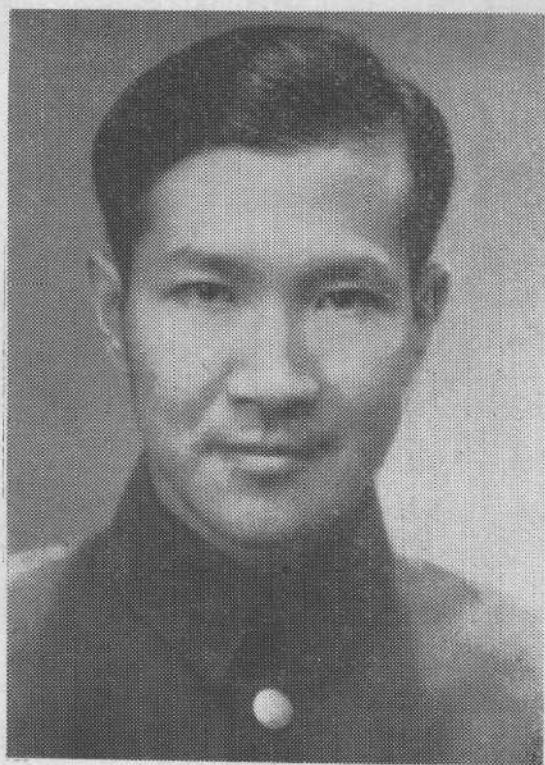
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

外文印刷厂印刷

787×1092毫米 32开本 80千文字 4.125印张
1980年4月北京第1版 1980年4月北京第1次印刷

印数：1—14,500册

书号：8026·3689 定价：0.41元



為人民的音樂
家洗星海風
志致哀
元月廿六

为抗战发出怒吼，
为大众谱出呼声！

星海同志

周思来

4.4.41. 七.1.1.
于延安

出版说明

近年来，我们收到许多读者来信，要求出版冼星海的有关文字资料。为了满足读者的要求，我们编辑了这本书。书中收集了冼星海写的《我学习音乐的经过》、《创作札记》、部分音乐论文和几封书信。

编辑这本书，主要根据以下几种材料：

一、《冼星海专辑》(一)、(二) (内部资料，1962年由原中央音乐学院中国音乐研究所黄翔鹏、齐毓怡编)；

二、《人民歌手冼星海》(丘远编，1949年12月生活·读书·新知三联书店发行)；

三、《人民音乐》1955年第八、九、十期；

四、《新音乐》第五卷第三期(1942年2月1日出版)。

我们在文字和标点符号方面作了一些校订工作。本书的注释，凡标有⊗*符号的，是《冼星海专辑》一书中的注释；冼星海自己的注释，用“原注”标出；其余注释为本书编者所加。

本书编辑过程中，得到中央音乐学院俞玉姿、徐士家两位同志的大力帮助，做了许多具体的编辑、校订工作。特此表示感谢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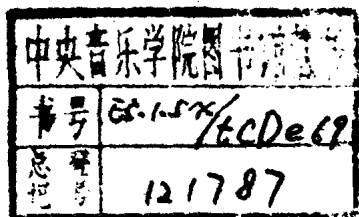
人民音乐出版社编辑部

一九七九年

目

录

我学习音乐的经过	(1)
创作札记	(20)
写给党组织的信	(83)
写给母亲的信	(86)
致洛阳歌咏队的信	(90)
普遍的音乐	(92)
悼亡师保罗·刁客士	(94)
救亡歌咏在洛阳	(99)
救亡音乐在抗战中的任务	(101)
在抗战中纪念聂耳	(102)
《反攻》歌曲集自序	(104)
为什么研究民歌	(107)
民歌与中国新兴音乐	(113)



我学习音乐的经过*

李凌兄：

我到这里已经一年多了。现在又是春天。每年春天，我总想多写些东西，而今年春天，怕还能更多写一些吧。我刚刚写完《三八妇女节》歌舞活报、《牺盟大合唱》，又要开手写《潞阳河》歌剧和《敌后抗日根据地大合唱》……。

我住的地方是在一条小溪流入一条河的山沟边，春天冰雪融化了，河水溪水浓重地、磅礴地向东奔流。在柳树枝头抹着苍绿的包围里，礼堂——从前是个教堂——的双塔尖插在明秀的天空，引起了异国的回忆，我想起你前次的来信。

你问起我的创作经验，我觉得我还谈不上什么经验，因为现在我也还在学习中。但为了感谢你给我的鼓励，只好不避厚颜将学习的经过乱七八糟地写下来，这样的东西，怕于你没有什么益处吧！

一、在 巴 黎

我曾在国内学音乐有好些年。在广州岭南大学教音乐的时

* 本文是沈星海同志应李凌同志之约而写的。最初发表于《新音乐》月刊1940年第二卷第三期。

候，感到国内学音乐的环境不方便，很想到法国去。同时，我奢想把我的音乐技巧学得很好，成功为“国际的”音乐家。正在考虑之际，凑巧得×××兄的帮忙，介绍了他在巴黎的先生奥别多菲尔(Paul Oberdoeffler)给我，于是我下了很大的决心，不顾自己的穷困，在1929年离开祖国到巴黎去。到了巴黎，找到餐馆跑堂的工作后，就开始跟这位世界名提琴师学提琴。奥别多菲尔先生，过去教×兄时，每月收学费二百佛郎（当时约合华币十元左右）。教我的时候，因打听出我是个做工的，就不收学费。接着我又找到路爱日·加隆(Noel Geillon)先生，跟他学“和声学”、“对位学”、“赋格曲”(Fugue，一种作曲要经过的课程)。加隆先生是巴黎音乐院的名教授，收学费每月也要二百佛郎，但他知道我的穷困后，也不收我的学费。我又跟“国民学派”士苛蓝港·多隆姆(唱歌学校——是巴黎最有名的音乐院之一，与巴黎音乐院齐名，也是专注重天才。与巴黎音乐院不同之处，是它不限制年龄。巴黎音乐院则只限廿岁上下才有资格入学。此外，它除了注意技巧外，对音乐理论更注意)这个学校的作曲教授丹地(V. d'Indy)学作曲，他算是我第一个教作曲的教师。以后，我又跟里昂古特(Lioncourt)先生学作曲。同时跟拉卑(La bey)先生学指挥。这些日子里，我还未入巴黎音乐院，生活穷困极了，常常妨碍学习。

我常常在失业与饥饿中，而且求救无门。在找到了职业时，学习的时间却又太少，在此时期我曾经做过各种各样的下役，像餐馆跑堂，理发店杂役，做过西崽(boy)，做过看守电话的佣

人和其他各种被人看作下贱的跑腿。在繁重琐屑的工作里，只能在忙里抽出一点时间来学习提琴，看看谱，练习作曲。但是时间都不能固定，除了上课的时间无论如何要想法去上课外，有时在晚上能够在厨房里学习提琴就好了，最糟的有时一早五点钟起来，直做到晚上十二点钟。有一次，因为白天上课弄得很累，回来又一直做到晚上九点，最后一次端菜上楼时，因为晕眩，连人带菜都摔倒，被骂了一顿之后，第二天就开除了。我很不愿把我是一个工读生的底细告诉我的同事们，甚至连老板也不告诉，因此，同事对我很不好，有些还忌刻我，在我要去上课的那天故意多找工作给我做，还打骂我，因此我也常打架。有一个同事是东北人，他看见我学习时，总是找出事来给我，譬如说壁上有丝尘，要我去揩等等。但我对他很好，常常给他写信回家（东北），他终于感动了，对我特别看待，给我衣服穿等等。可是我还不告诉他我入学的事。

我失过十几次业，饿饭、找不到住处，一切的问题都来了。有几次又冷又饿，实在支持不住，在街上软瘫下来了。我那时想大概要饿死了。幸而总侥幸碰到些救助的人，这些人是个些外国的流浪者（有些是没落贵族，有些是白俄）。大概他们知道我能弹奏提琴，所以常在什么宴会里请我弹奏，每次给一二百佛郎，有时多的一千佛郎。有对白俄夫妇，已没落到做苦工，他们已知道了劳动者的苦楚，他们竟把得到的很微薄的工资帮助我——请我吃饭。我这样的过朝挨夕，谈不上什么安定。有过好几天，饿得快死，没法只得提了提琴到咖啡馆、大餐馆中去拉奏讨钱，忍着羞

辱拉了整天得不到多少钱，回到寓所不觉痛哭起来。把钱扔到地下，但又不得不拾起。门外房东在敲门要房金，如不把讨到的钱给他，就有到捕房去坐牢的危险（其实不是为了学习，倒是个活路）。有一次讨钱的时候，一个有钱的中国留学生把我的碟子摔碎，掌我的颊，说我丢中国人的丑！我当时不能反抗，含着泪，悲愤得说不出话来——在巴黎的中国留学生很不喜欢我，他们都很富有，还有些领了很大一笔津贴，但却不借给我一文。有时，我并不是为了借钱去找他们，但他们把门闭上，门口摆着两双到四双擦亮的皮鞋（男的、女的）。

我忍受生活的折磨，对于学音乐虽不灰心，但有时也感到迷惘和不乐，幸而教师们肯帮助我，鼓励我，在开音乐会演奏名曲时，常送我票。奥别多菲尔先生在一个名音乐会里演他的提琴独奏（Thais）时，不厌我穷拙，给我坐前排。这些对我意外的关怀，时时促使我重新提起勇气，同时也给我扩大了眼界。我的学习自己觉得逐渐有些进步，我写了好多东西，我学习应用很复杂的技巧。

在困苦生活的时日，对祖国的消息和怀念也催迫着我努力。

我很喜欢看法国国庆节和“贞德节”的大游行。这两个节是法国很大的节日，纪念的那天，参加的人非常拥挤。有整齐的步兵、卫队、坦克队、飞机队等。民众非常热烈地唱国歌，三色国旗飘扬。我每次都很感动。在1932年，东北失陷的第二年，到那些节日，我照例去看游行。但是那次群众爱护他们祖国的狂热，和法国国歌的悲壮声，猛烈地打动了。我想到自己多难的祖国，

和三年以来在巴黎受尽的种种辛酸、无助、孤单、悲痛、哀愁、抑郁的感情混合在一起，我两眼充满了泪水，回到店里偷偷地哭起来。在悲痛里我起了应该怎样去挽救祖国的危亡的思念。

我那时是个工人，我参加了“国际工会”。工会里常放映些关于祖国的新闻片和有一些照片。我从上面看到了祖国的大水灾，看到了流离失所、饥饿死亡的同胞；看到了黄包车（人力车）和其他劳苦工人的生活；看到了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党派分裂，国民党的大屠杀，……这些情形，更加深我的思念、隐忧、焦急。

我把对于祖国的那些感触用音乐写下来，像我把生活中的痛楚用音乐写下来一样。我渐渐把不顾内容的技巧（这是“学院派”艺术至上的特点）用来描写、诉说痛苦的人生、被压迫的祖国。我不管这高尚不高尚。在初到法国的时候，我有艺术家的所谓“慎重”，我对于一个创作要花一年的功夫完成，或者一年写一个东西，像小提琴及钢琴合奏的《索拿大》，我就花了八个月的功夫。但以后，就不是这样了。我写自以为比较成功的作品《风》的时候，正是生活逼得走投无路的时候，我住在一间七层楼上的破小房子里，这间房子的门窗都破了，巴黎的天气本来比中国南方冷，那年冬天的那夜又刮大风，我没有棉被，睡也睡不成，只得点灯写作，那知风猛烈吹进，煤油灯（我安不起电灯）吹灭了又吹灭。我伤心极了，我打着战，听寒风打着墙壁，穿过门窗，猛烈嘶吼，我的心也跟着猛烈撼动。一切人生的祖国的苦、辣、辛、酸、不幸，都汹涌起来。我不能控制自己的感情，于是

借风述怀，写成了这个作品。以后，我又把对祖国的思念写成《游子吟》、《中国古诗》和其他的作品。

我想不到《风》那么受人欢迎，我的先生们很称赞它，旧俄的音乐家（现在已同情苏联），也是现在世界有名的音乐家普罗珂菲叶夫也很爱它。并且它能在巴黎播音（上面说过的《索拿大》也被播）和公开演奏。

大概因为作品和别的先生的介绍，我侥幸得识了巴黎音乐院的大作曲家普罗·刁客（Paul Dukas）先生，他是世界三大音乐家之一（印象派）。更侥幸的是他竟肯收我做门生，他给我各种援助，送我衣服，送我钱，不断地鼓励我。还派他的门生送我乐谱、香烟（我当时不抽烟，没有收下），并答应准我考巴黎音乐院的高级作曲班。在这以前，一个法国的女青年作曲家，也给我很大的帮忙。她亲自弹奏过我的作品，她鼓励我不要灰心，她教我学唱，学法文，经济上不时周济我（她的母亲待我也很好）。在考巴黎音乐院的时候，她先练习了八个月的钢琴为我伴奏。

报考的那天，巴黎音乐院的门警不放我进门，因为我的衣服不相称（袖子长了几寸的西服），又是个中国人。我对门警说，我是来报考高级作曲班的，他不相信，因为中国人考初级班的也很少，而且来的多是衣冠楚楚的人。高级班过去只有×××兄入过提琴班。这样就难怪他阻挡我了。正在为难，恰巧普罗·刁客先生从外面来，他攀着我的肩一同进去了。

我总算万幸考入了高级作曲班，考到了个荣誉奖。他们送给我物质的奖品时，问我要什么？我说要饭票，他们就送了我一束

饭票。入学后，我专心学作曲，兼学指挥，并在“国民学派”士苛蓝港·多隆姆学音乐理论。在生活上较有办法了。学校准许我在校内吃饭，刁客先生更常帮助我。不过比起别人来，我穷得多。学习上物质的需求还很难解决，如买书就不易，所以我几次要求政府给公费。照我的成绩及资格说来，是应得公费的，但祖国政府对我的几番请求都没答复。学校给证明，甚至当时巴黎市长赫理欧也有证明文件都不行。我很失望。我记得有一年，有个要人到巴黎来，找我当翻译，我顺便要求他给我想法资助去德国学军乐（那时我还未入巴黎音乐院），回来为祖国服务。他那时虽是对外宣传中国需要抗日，却不能答应我的请求。而我入了巴黎音乐院之后，要想望遥遥的政府给公费，自更困难了。结果是从始到终一文公费也领不到，我在巴黎音乐院的几年生活，只靠师长和学校的帮助。

1935年春，我在作曲班毕了业，刁客先生逝世，我就不能再继续留在巴黎研究了。另一方面我也想急于回国，把我的力量贡献给国家。所以临行时，上面说过的那位女青年作曲家劝我再留在巴黎，我也不肯再留，为不却她的盛意，我对她说谎，说半年后就回到巴黎来。我有许多曲稿还留在她那里，还有许多书籍稿件也关在别处一间小寓所里，因为没钱交房租，不能去取回来，大概现在还在吧！

1935年初夏，我作最后一次欧洲的旅行。几年来我把欧洲主要的许多大小国家的名城、首都都游过了，增长了很多知识。这最后一次到伦敦的旅行，却很不顺利。登岸时，英政府不准我入

境，他看见我的证明文件及穷样子，以为我是到伦敦找事做的，他不相信我是旅行者。我被扣留了几个钟头，亏得能打电话到公使馆才被释放了。帝国主义对弱小民族是歧视的，英国的成见尤深。

二、回到祖国

从伦敦回来之后，我就起程回中国了。

在回国的途上，因为没有钱，得了友人之助，坐了货船。一路和回国的工人、水手一起生活，非常愉快。对于工人，我很合得来。其实我自己也算“半个”工人。在巴黎的近郊，我参加过华工的一个很大的晚会，那时欧阳予倩先生也在，我为工人们奏提琴，我自己也很快乐。这次回国，虽然享不到人们坐邮船那种福，但说说笑笑、坦白真挚的生活也很好。我们行船，经过许多地方。到非洲时，我还上岸去观光了一趟。

船到香港，喜悦和愤怒一齐起来了。喜的是一别七年的祖国已在望，愤怒的是香港的那种建筑一律是殖民地式，连颜色也一样。以前未到欧洲不知道此种耻辱。到过了巴黎，看过殖民地展览会，和亲眼看过非洲及安南等地的建筑后，这种愤怒是不能不起来了。等到印度巡捕故意和我们为难的时候，更加忿恨。以后到了上海，除像香港所得到的不快外，还加上码头工人的破烂的刺激，比起在巴黎影片里看到的更使我难过。

我在上海北四川路旁的一个亭子间里，会见了一别七年的母亲。她比从前苍老了许多。七年来，只靠自己养活自己，让我去

追求我的理想，她那种自我牺牲的母性，使我自觉难受得很。我那时想：我要好好地服侍她，不再让她受苦了。

但是我找不到职业，我还要吃母亲的饭。以后，搬了家，招收了几个学提琴的学生，算是暂时解决了生活的问题。

那年秋江北大水灾，我应了“南国社”友人之邀到南京去，要看大水灾，后因故不能成行。在南京时跟过友人到歌女处听唱。他们一边和歌女周旋，我在旁记下她们的曲调和情绪，我想使我的音乐创作能够充满着各种被压迫的同胞的呼声，这样我才能把音乐为被压迫的祖国服务。回上海后，我的第一个回国的作品写成了，那是影片《时势英雄》的插曲《运动会歌》。“一二九”运动起来，上海的大、中学里有些学生和我相识，他们寒假到街头宣传和示威游行，要我写个歌。我写了个《我们要抵抗》，这是我第一个救亡歌曲（现在原稿都失掉了）。接着又写了《战歌》、《救国进行曲》。这两个歌和《运动会歌》都收入百代公司唱片。因为《战歌》等的唱片销路速度打破了百代公司的其他唱片的记录，百代公司愿意聘请我了。我也满意这个职业，因为可以大大地收些救亡歌曲。可是这满意很快被打消，《战歌》的唱片及底片被没收、打毁后，百代公司的老板就不愿收救亡唱片了。我在那里，只是做做配音，做一些生意眼的工作。但这种工作耽搁我的时候不少，妨碍我的创作和发展。那时我觉得民族危机很深，我开始着手写《民族交响乐》（大乐曲），要有很多时间才行。另一方面，百代公司待遇的不平（有些技术很差的人薪水比我多八倍）和某些同事用买办气的态度来对待我，我也很不快，因此不